

8

现代上海研究论丛

Xian Dai Shang Hai Yan Jiu Lun Cong

现代上海研究中心

副
主
编

吴徐顾俞
祥建克
华刚明
(常务)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8

现代上海研究论丛

Xian Dai Shang Hai Yan Jiu Lun Cong

现代上海研究中心

副
主
编

吴徐顾俞
祥建克
华刚明
(常
务)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上海研究论丛. 第8辑 / 俞克明主编. —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458-0298-6

I. ①现… II. ①俞… III. ①上海市—地方史—研究
—现代—文集 IV. ①K29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3202 号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封面设计 郑书径

技术编辑 丁 多

现代上海研究论丛(8)

现代上海研究中心

俞克明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70,000

2010 年 10 月第一版 201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458-0298-6/K·46

定价：40.00 元

目 录

史海钩沉

上海解放初期对银行业接管改造的方针政策评析	… 马长林	1
解放初期党在上海的文化政策与文化领导能力建设	… 都培炎	15
工业化主导下的城市空间变奏		
——“大跃进”时期上海的卫星城建设	… 黄 坚	24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副食品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 裴先白	40
梅山初创时期的回顾	… 宋星路	52

世博纵横

城市最佳实践区后续利用的初步思考	… 周振华 钱 智	59
世博会与海派文化发展的思考	… 潘 光 夏 雪	79
黄炎培教育考察视域下的巴拿马世博会	… 吴海勇	85
借鉴延续世博效应 推进城市发展创新	… 施蔷生	94
把每个志愿者服务点建成守护平安的“阳光驿站”		
	… 尤 易 田保传	104

现代论坛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主要路径:提高市场开 放度和贸易便利化程度	… 郑惠强	108
浅谈政府法制工作的科学思维方式	… 刘 华	123
关于完善政协民主监督十项机制的设想	… 周关东	129

- 上海的未来需要企业家 钟祥财 138

城市关注

- 上海时尚之都的兴起、衰落与再崛起研究 杨明刚 146
关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科技与经济的关系
问题 刘振元 185
中国城市发展的人文命题 秦德君 199
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现状与思考
..... 方 宁 朱叶慧 205
试论加快宝山精品钢材产业基地发展的路径 朱擎华 219
“政府空心化”与居委会“议行分离”模式 解 蕾 227

专题交流

- 老上海同业公会业规与社会经济运行若干方面
关系浅析 陈正卿 237
沪甬携手 共创辉煌
——上海市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二十周年回眸
..... 童志强 255
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研究
——以中国制造类企业的阶层分析为例 范国荣 276
五四之后上海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和作用 沈建中 286

人物

- 黄炎培在抗日战争中的转变历程 侯桂芳 299
求真务实
——陈云在上海留下的珍贵精神遗产 徐国梁 313
身为造船人,我很自豪 胡传治 322

2009 年现代上海研究综述	段春义	329
2009 年现代上海研究部分文章目录索引	徐 平 整理	338
后记		349

上海解放初期对银行业接管 改造的方针政策评析

马长林

1949年上海解放时新政权面临的对银行业的接管及此后的改造,是众多行业接管和改造中比较艰巨的任务,工作量大、情况复杂、政策性强等特点,决定了要顺利完成此项任务难度很大。然从1949年5月到1952年,经过短短三年多时间,由华东财委金融处和上海军管会金融接管处具体负责的银行接管和改造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为保证上海乃至全国解放后金融形势的稳定和经济恢复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关上海解放初期金融接管方面的情况,以前学界少有研究,近年来有多项研究成果发表,使我们对这一特殊时期上海金融业的巨大变化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①然就上海解放初期金融行业的接管和改造而言,尽管其进展顺利,但实际情况远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复杂。金融领域课题研究的延伸、观念的转变,以及相关原始档案的陆续开放和有关人员口述历史资料的整理,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具体更全面地了解当年的历史进程。笔者本此宗旨,拟利用有关档案和文献资料,从新政

^① 此类研究成果主要有吴景平、张徐乐《接管上海官僚资本金融机构述论》(《近代史研究》2003年4期),吴景平、张徐乐《关于研究1949—1952年期间上海私营金融业的若干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1期),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的联合之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3期),张徐乐《建国后上海私营金融业的整顿管理述论》(《社会科学》2003年5期)。

权的政策层面,包括方针政策的发展演变、政策的具体贯彻实施等,对上海解放初期银行业接管改造作些探讨,以期同已有的研究形成立体的观照。

一、对官僚资本银行的接管政策及其实施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根据4月25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规定的“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条文,^①从5月28日起,新成立的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即派出军代表分别进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国民党政府所办的金融机构进行接管。此项接管,按照自上而下,整套接收的方针,一般都经过四个阶段:1. 责令被接管单位原负责人办理移交,同时依靠地下党,开始组织积极分子。2. 初步接管,按照接得愈快愈好的“快接”精神,进行接收。3. 开展“细收”工作,进行全面点收稽核。4. 组织清理处,进行债权债务的清理。而具体的接管工作步骤又分先接收、后清理两大步骤,即1949年5月29日到同年9月上旬,为第一步,从9月12日成立清理处至1950年3月这些银行的债权债务清理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为第二步。^②

面对数量众多、人员庞杂的国民党官僚资本银行的接管,由于在北方的解放区类似的接管工作已经进行过,再加负责接管的军代表大部分是对金融行业比较熟悉的干部,所以总的来说,接管工作的进展比较顺利。其中特别让人引起注意的是,新政权及时制定和明确相关的接管方针和政策。

1949年6月底,从5月下旬开始派军管会代表直接对官僚资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接管上海》(上卷),第14页,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张继凤《金融接管》,《接管上海》(下卷),第200—203页。

本银行进行的接管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情况已基本清楚，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地对这些银行进行处置。6月30日，华东财委发布了“关于当前三个金融问题的指示”，对于如何进一步处置这些已被接管一个月的官僚资本银行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意见。指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意见，及平津施行的办法”，对已被接管的官僚资本银行明确了以下处置方案：

1. 将原中央银行改建为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及上海分行；
2. 原中国银行停止其董事会，其职权委派新的人员负责领导，保持原机构，在华东区行政领导下，向外汇及对外贸易专业银行发展；
3. 交通银行同中国银行一样保持原机构，向投资及工矿交通专业银行发展；
4. 邮政储蓄汇业局、中国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改建为合作储蓄银行；
5. 原省市银行在目前尚无独立设立之必要，其业务可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理，由此省银行完全撤销。^①

这些政策规定，为接管工作同此后某些被接管银行功能的转换、机构作用的延续明确了方向，将接管工作同新金融机构的建设衔接起来，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新金融机构建设的困难。

接管过程中发动群众，依靠积极分子来协助接管工作的进行，也是颇具特色的，可以说是在实施接管政策过程中产生的具体做法。军代表在各个被接管单位，都“依靠积极分子，团结广大职工，协助接管”，如在中央银行，军代表“组织了职工协助接管小组12个，成员135人，协助点收。又组织5个协助稽核小组，成员63人，协助稽核各项移交报表。”^②

接管工作中对银行财产的清点工作，工作量大而且复杂，此项工作开展得深入仔细，也值得予以重视。现存的档案表明，在原上海市银行的接管过程中，每个参加清点工作的人员在清点工作完

^① 1949年6月30日《华东财委会关于当前三个金融问题的指示》，《接管上海》（上卷），第351—355页。

^② 张继凤《金融接管》，《接管上海》（下卷），第202页。

成后都要填写一份“清点小组总结工作报告”，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清点工作所进行的细致程度。这种工作总结报告不是以写文章的形式，而是通过对预先设置的十项栏目的填写来反映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等。这十项栏目的名称分别是：

1. 工作概括(即清点单位或何项物品);2. 遭遇何种困难,如何解决;3. 工作态度检讨,消极的和积极的;4. 优点和缺点;5. 个人感想;6. 清点过程中思想状况;7. 与审核组配合情形如何;
8. 对领导意见;9. 工作人员相互意见;10. 一般反映状况。^①

这些报告的填写都十分认真,如在一份由陈仁达填写的“清点小组总结工作报告”中,他这样填写:

工作概括栏:周余工作大致可分几方面:1. 检点库存金银外币及寄存品计银元 16654 元,银角 105006 角,美钞 1696 元,黄金 611.203 两。2. 清点稽核处文卷及前市银行放款凭证、担保品及寄存文卷 27 宗,证件担保品等 35 项。3. 清点四楼及屋顶全部营业用器具、器皿,编造清册,共计 4249 件。4. 重新代总务处编造全行现在使用文具用品,移交清册,计统计全行文具用品共件。^②

遭遇何种困难,如何解决栏:点验库存金银外币,银圆外币尚无困难,黄金成色与分量有专门性,发生困难,后请由老宝庆银楼李靖孙李庄孙两先生来协助,始告顺利解决。清点四楼屋顶营业用器皿,因四楼大部分系同人宿舍,公私物品甚难划分,后由总务处及福利会会同布告同人书面登记私有物品,始免混杂,又因为门锁较严,常因觅钥匙而浪费时间。清查总务处现在使用文具移交清册,因其编造太简,遗漏物品过多,无法清查,后经重新编印统计表分发各单位从详填入,加以统计,遗漏已减至最低限度。

个人感想栏:市银行这个机构相当庞大而又复杂,由于当局的

^①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Q61 - 1 - 1424。

^② 此处档案原件上数字空缺。

自私与任用私人,因此对于行的利益处于次要,从这次清点工作看来,我们看到多少不合理的措施及浪费的地方,假使我们全行同人都能像现在公开管理本行的话,决不至于办理移交像一团糟。

清点过程中思想状况栏:过去我一向抱着以工作劳力换取生活的必要酬报,做自己应做的事,不预同行事,而现在我感到大众的事需要大众来干,只有集中力量才能干出完善的大事业来。

对领导意见栏:我们的组长庄祖苓先生是一位非常负责而又和蔼的领导者,对于各方面工作不厌其详的解释,虽然有时候指挥欠有条理,但不妨碍工作顺利进行,副组长翁泽永先生头脑清晰,做事有条理,分配工作能够适应需要,补助了庄先生的不足。

一般反映情况栏:一般地讲,这次工作展开,工作者的态度严肃,动机纯正,都能得到好评,但清点时的对象(总务处)以前没有把同事看在眼里,现在以为是我们报仇,故意去找他们的错处,抱着敌视的态度。^①

从这份清点小组总结工作报告填写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清点工作琐碎复杂,颇有难度,清点过程中原有部门同清点人员的关系也颇复杂,清点人员的积极性是毫无疑问的,与此同时,经过这样的参与,也多少使参与清点的人员在思想上接受了教育。所以说通过依靠积极分子参与,协助进行接管的有关工作,是当时新政府采取的从实际出发又行之有效的做法,这也是接管工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的重要原因。

二、对有官僚资本商业银行的接管政策及其实施

1949年6月30日华东财委发布的“关于当前三个金融问题的指示”中,除了对纯粹官僚资本银行的处置作了明确外,对几家

^①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Q61-1-1424。

有官僚资本的商业银行的处置也分别作了明确的政策规定：

1. 四明银行，因其资产主要是房地产，如该行取消，则这批房地产管理即成问题，故须保持其原有机构，逐渐加以改造，调整使其成为经营城市公有房地产的主业银行，各地分支机构之存在与否，即以当地是否需要有房地产专业银行为标准。

2. 中国实业银行，因其主要资金投资于各工厂，今后可保留其机构，管理其他投资之企业，并与中小私人工商业进行短期资金周转，并逐渐改造其工作制度与作风，使适合其性质，担负其任务。

3. 中国通商银行，考虑到该行“名为官商合办，实为杜月笙个人所操纵，资金全无，凡属有钱可赚之营业，均转入杜月笙私人之其他经营机构中，此银行仅是一个空架子，提议抽出官股结束此银行”。

4. 中国国货银行，因“全部帐册，及资产均已南逃，只留下一百七十个人，故结束此一机构”。

5. 新华银行，因该行在业务上比较有生气，故对其采取“机构保留，发扬其业务的优点”的方针，并且强调此业务是全体职工的共同创造，而非个别经理等所创造。

6. 其他实际是官僚资本而以私人面目出现的小银行，如广东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山西裕华银行、亚东银行等，均予以结束进行清理。^①

上述华东财委的方针，是随着对旧上海银行业官僚资本银行的接管和清理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意见以及北京、天津已经实行的做法，所作出的一系列政策决定。

对有官僚资本的商业银行的处置方针尽管作了明确，但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情况比预想得要复杂，主要的问题是涉及

^① 1949年6月30日《华东财委会关于当前三个金融问题的指示》，《接管上海》（上卷），第351—355页。

新政权对民族资本家如何处置的问题。同时,在国民党官僚资本银行全部结束,新政权所属的国家银行的业务还没有全面建立和开展之时,如何充分发挥这些对金融业务熟悉,在全国各地仍有一个金融网络机构的银行的作用,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

因此,在华东财委三点指示下达后不久,在上述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就是除了中国国货银行在进行清理后真正结束外,中国通商银行并没有如指示所明确的那样予以结束,而是同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新华银行一起,继续存在,并成为后来建立的公私合营银行联营机构的主要成员。

按照华东财委的三点指示对原有官僚资本的商业银行实行公私合营后,这些银行的经营一度处于裹足不前的境地,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在给华东财委的报告中描述分析当时上海私营银行的现状时说:“大银行在外汇资金遭受冻结,外汇业务收益减少,赤字无法弥补,目前尚有亏损,资方方面对困难尚不肯打开包袱,毫无顾虑地与劳方开诚进行协商,劳方在待遇上亦不肯让步,其主要希望转向依靠我们增加拆款或变卖产业与我,在公私兼顾的方针下,增拆变产均不可能,因此周作民领导下所进行者五行合并和联合,内部无法团结,相互观望。”^①另外,这些“大银行的劳资双方,由于依赖心理,企图把一些有价无市的不动产卖给人民银行,把死资本变成活资本”,这样就“远未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彻底的进行精简改造,亏损仍继续增加”。加上当时美国进行的资金冻结和贸易封锁的影响,“使这些银行陷于严重困难的境地。”^②

对公私合营银行的政策是新政权团结改造银行业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政策,当时即明确:“我们对合营银行的方针是争取成为公私金融业间的桥梁,逐步改造为国家银行的组成部分,改造其干部

① 1951年2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呈华东财委报告。

② 1951年初华东财委《对上海公私合营银行及私营金融业领导与管理工作总结》。

成为国家银行的干部。”根据这一方针,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采取了灵活的办法。其灵活的方法之一是“根据各行领导人的态度,组织机构与业务情况予以分别处理”。例如对新华银行,“着重争取王志莘消除其顾虑”,“在整编工作上曾经迁就一些,但对其隐避暗帐,则严肃斗争,以达到使其服从领导”。对其他顾虑较少的中国实业、四明和中国通商银行,“则着重在机构整编,迅速展开业务”。“在处理各行内部人事派系问题上,对政治性派系,则支持在政治上靠拢我的”,“对仅属一般权利之争的人物派系,则采取超然的态度”,“但不放弃对其教育”。在领导方式上,“尽可能避免过早在组织上变动其负责人,以减少其顾虑,军事特派员保留对重大问题的最后决定权,但不经常地干涉其日常业务”。^①

对于公私合营银行包括私营银行采取切合实际情况的正确方针,这是新政权建立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部分,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上,根据实际出现的情况,确定了调整金融业中公私关系的认识,提出:“从全面来看,从发展来看,尚需团结公私金融力量,在扶持生产的基础上求共同发展,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公私金融在发展中,是‘一视同仁’的,凡是任何可以办理的业务,应当准许办理。”这次会议对于公私金融机构共同发展业务也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如在吸收存款方面,明确“为了广泛集聚社会一切可能集中的资金,以扶持生产,必须动员全部公私行庄力量,大力开展存款业务”。^②

如果说1950年8月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的重点是调整对金融业中公私关系的认识,充分发挥公私金融机构扶持生产的作用的话,那么几个月后,在1951年初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金融会议,又为确定对公私合营银行新的政策——实行进一步的集中领导奠定

① 1951年初华东财委《对上海公私合营银行及私营金融业领导与管理工作总结》。

② 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综合记录。

了基调。会议所作出的关于国家银行的主要工作决定明确指出：“对公私合营银行，加强领导与改造，建立合营银行联合的管理机构，实行进一步的集中领导。”根据这一方针，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提出了为加强对公私合营银行的领导，建立联合管理处的设想和具体实施步骤。对这个设想的实施，华东区行有很大的把握，因为对重要的私营银行在组织联合管理机构方面的态度已经作了了解：“对这一问题在现阶段基本上是成熟的，并且各行负责人思想上都有准备，在四明、通商，官股比例大行处少，希望能彻底合并，在新华、中实，因尚有部分私股，行处多，在统一程度上有些差别。四行负责人由王志莘发起，曾一度与杨锡山、毛啸岑、张纪元四人集议商讨对成立总管理处的初步意见。”这几个人商讨的初步意见是：“1. 人事集中统一调度，待遇逐步统一。2. 业务统一经营，分业推进，业务上盈亏统一计算，按成划分。3. 各行原有名义对外保留，管理部门集中总管理处掌握。4. 资本产业暂不合并。5. 总管理处设上海，另在中南、西南、华北、华南设立分处，领导分支行处。”由此华东区行决定：“新五行总管理处的组织必须是一个最高权力机构”，在实际操作步骤上，一方面召开职工座谈会听取意见，并经过公股董事分别与各行负责人进行商谈，此后即由华东区行出面招待各行负责人产生发起人，然后商谈具体办法提交各行董事会通过后正式成立。^①

由此可见，对公私合营银行加强领导并以合营银行总管理处方式来实施，是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的，华东财委在事后总结时认为：“在华东财委与总行的领导下，开始对私营金融业及合营银行的领导有了明确的政治方针，这是搞好工作的主要关键，否则极易陷于技术性的领导，分不清轻重缓急。”^②表明加强对公私合营银

^① 1951年2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呈华东财委《关于加强公私合营银行领导，建立管理处和实施步骤的报告》。

^② 1951年初华东财委《对上海公私合营银行及私营金融业领导与管理工作总结》。

行领导的方针，并不是在一开始就明确的，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明确的政策。

加强领导可以说是新政权经过接管清理阶段后对公私合营银行进行团结改造的根本性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具体策略的实施，对于比较顺利地实现对公私合营银行的领导，达到新政府预期的目的，也十分重要。在这方面，职能部门在实践中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对私营金融业的领导，就是对金融资本家的领导，因之，团结与斗争的分寸要很好的掌握”。在实际操作中主要根据三方面情况来掌握：第一，“根据总的政治任务，即是以团结为主的政策，但在物价不稳、投机盛行时，则经过管制削弱，以达到政治上的团结”。第二，“根据对方的态度，当对方已经证实其向我们靠拢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强调斗争，而以团结教育改造为主”。第三，“根据整个政治空气”，在 1950 年三四月间工商业普遍困难，行庄集中倒闭，职工大批失业，社会存户普遍不安时，则“及时采取缓和倒闭的方式，以保持政治上的主动”。^①

根据进一步加强领导的方针，1951 年 5 月成立了由新华、中国实业、四明、中国通商、建业 5 家公私合营银行参加的联合董事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并成立了总管理处，到 10 月份，加入总管理处的银行进一步扩大，有 11 家，其开展的存款业务占到全国存款总量的 47%，成为当时上海银行业务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三、对纯粹私营行庄的政策

上海解放初期华东财经委对私营银行（包括钱庄）的政策，基本上是团结改造、加强管理和领导，华东财经委将它概括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上海解放至 1950 年 6 月，“这一时期私营行庄与

^① 1951 年初华东财委《对上海公私合营银行及私营金融业领导与管理工作总结》。

投机市场密切结合,对我之言理基本上是对抗的,我们的方针是严格管制,打击削弱为主”。在这一时期“对对抗管理办法经营投机的金融业采取严厉处分的方针,并掌握稳准狠的原则,以镇压主要操纵市场投机市场的分子为主,对投机者沉重打击,我并取得政治上的主动”。这一时期因“财经统一,通货日趋稳定,私营商业弱点暴露”,私营行庄自1950年3月后集中倒闭,“此时所采取的原则是指出倒闭是投机违法的结果,使已倒者‘死而无怨’,同时对倒风适当加以缓和,使未倒者感激,从而减少对当时公私关系紧张状况的刺激作用”。第二个时期是1950年8月到1951年初,这一时期“私营行庄经过四五月倒风以后,知道与政府对抗是不利的,同时由于人民银行的壮大,他们转而依赖政府”。在这一时期采取的方针是“团结改造领导并运用其力量以扶助工商业”,并确定了私营行庄“大的靠(靠拢人民银行)小的并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政府有关部门对小的行庄“鼓励其组织联营集团,支持政治上较开明的人物,主持联营集团,把我们领导行庄的原则贯彻到集团的组织章程中去”。由此将分散的四十多家行庄组成了四个集团,一方面便于领导,一方面用这些行庄“自己承认的集团的章程约束他们的不法行为”。^①

加入集团的行庄确有一部分经过初步整编,增强了社会信用,渡过了困难。而新政权对行庄的照顾根据“惠而不费”的原则,准许行庄在周转困难时向国家银行申请转抵押。同时,在有关公私关系的具体措施中,结合了总的方针将行庄进一步约束在国家金融政策之下,防止其盲目和投机。

^① 1951年初华东财委《对上海公私合营银行及私营金融业领导与管理工作总结》。